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

● 近现代卷

主编 杨继国

本卷主编 赵 慧 拜学英 王继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

● 近现代卷

主编 杨继国

本卷主编 赵 慧 拜学英 王继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近现代卷 / 杨继国主编; 赵慧, 拜学英, 王继霞
本卷主编.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5-1699-9

I. ①中… II. ①杨… ②赵… ③拜… ④王… III. ①回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近现代 IV. ①I207.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3356号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近现代卷

杨继国 主编 赵 慧 拜学英 王继霞 本卷主编

责任编辑 闫智红 陈文军 金孝立 王佐红 李少敏

特邀编辑 龙城顺

封面设计 水 木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709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99-9/I·518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近现代卷

绪 论 / 001第一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发展背景 / 001第二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发展概况 / 003

第三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主要特征 / 007

第一章 近代回族文学（一） / 009第一节 近代回族文学概述 / 009第二节 马之龙 / 015

第三节 关里爷与《热什哈尔》 / 023

第四节 马德新 / 030

第五节 蒋湘南 / 038第六节 马安礼 / 051第七节 马观政 / 055第二章 近代回族文学（二） / 059第一节 马元章 / 059

第二节 哈 锐 / 082

第三节 龚选廉 / 091

第四节 马介泉 / 097

第三章 近代回族报刊文学 / 101第一节 丁宝臣与《正宗爱国报》 / 103

第二节 童琮、黄镇磐与《醒回篇》 / 107

第三节 近代回族报刊文学的特点 / 110

第四章 现代回族文学 / 113

第一节 现代回族文学概述 / 113

第二节 马福祥 / 116

第三节 马书城 / 130

第四节 刘孟扬 / 133

第五节 马 骏 / 138

第六节 马 骥 / 150

第七节 刘曼卿 / 156

第八节 薛文波 / 163

第五章 现代回族报刊文学 / 185

第一节 现代回族报刊与小说 / 185

第二节 现代回族报刊与诗歌 / 202

第三节 现代回族报刊与散文 / 212

第四节 现代回族报刊与儿童文学 / 224

第五节 现代回族报刊文学的特点 / 227

第六章 近现代回族翻译文学（一） / 233

第一节 发展概述 / 233

第二节 《古兰经》的翻译 / 242

第三节 穆罕默德圣训和传记的翻译 / 263

第七章 近现代回族翻译文学（二） / 277

第一节 历史文学类作品的翻译（一） / 277

第二节 历史文学类作品的翻译（二） / 299

参考文献 / 309

绪 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回族作为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大致同步的进程，因而这里所涉及的回族近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其间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段为中国回族文学史的近代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为中国回族文学史的现代阶段（对于跨越近现代的作家，则依据其主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年代而定）。

第一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发展背景

回族先民自唐代始进入中华本土，经过长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调适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并伴随而生了一种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新的文化类型，即回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回族人民为适应生存而选择了“适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文化交融原则，在坚守伊斯兰文化的同时有选择地接受汉文化，并积极有效地坚持二者创造性的有机结合。在此过程中，回族人民与中国各民族人民形成了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回族的命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之中，回族的发展也同步于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潮流。这一特点十分鲜明地体现在近现代回族文学发展史中。

近现代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震荡与急速变化的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清政府独立行使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而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首先是香港岛被英国割占，中国

的领土开始丧失。1849年,澳门也被葡萄牙霸占。此外,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领海权等开始遭到侵犯和破坏,中国逐渐沦为领土和主权都不完整的半独立的国家。其次,在东南沿海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租界。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强迫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将八百三十亩土地专供洋人租地建屋,即为英租界,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租界,此后,美、法两国也仿效英国在上海划定了租界。随着列强侵略势力的扩张,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租界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战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战后,这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时,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产生,第一批产业工人出现,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少,影响小,但都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同时,买办商人增多,买办阶级开始出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买办的经济势力不断发展,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此,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它宣传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它颁布的一系列保护、奖励和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对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思想文化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随之兴起,一些维新倡导者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并初步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设想。其主要内容为: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革命政治,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思想要求变革现状,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主张维护民族利益的诉求具有爱国性,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方向。这些宣传对中国人民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有利于西方的新

思想和新事物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前,深刻的社会危机促使一部分明智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倡言兴利除弊。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求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方。战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一股倡言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新思潮,从而开始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奋斗历程。

对于中国各民族人民而言,共同的命运是: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他们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只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才可能实现民族平等。因此,国内民族关系体现为中国各民族在外来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空前凝聚,中华民族华夷之辨的区分被中华民族的认同所代替。历史赋予中国民族关系史以新的内容,各民族人民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构成了近代民族历史的主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回族在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

第二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的回族知识分子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积极投入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先进的回族人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族的道理,提倡回民教育,组织爱国回民社团,同时创办报刊,宣传倡导时代精神。出现了《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醒时白话报》、《醒回篇》等一批回族报刊。北平人丁竹园、丁宝臣兄弟是回族报纸最早的创办人。而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回族期刊《醒回篇》虽然只出版一期,但它集中反映了回族知识分子强烈反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爱国热忱,表达了他们振兴回族必须改良宗教、强盛国家必须普及教育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伴随着回族学者的著述和编译,一批伊斯兰教典籍相继出版,推动了伊斯兰教知识的普及和研究。宗教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宗教制度则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回族的分散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1840年起至1919年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动摇崩溃和自给自足的以农业及个体工商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解体的时期,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反抗外来侵略及反对封建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时期。这种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当时的中国社

会呈现出动荡与危机共存、民众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探索能力的增强及向西方学习、从封闭走向开放等特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大变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输入，封建帝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新形势、新情况、新事物、新思想、新追求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冲击，迫使中国近代文化精神发生了深刻变化。求变，致用，推崇科学与民主，民族自尊心与爱国精神高扬，这些巨大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包括回族文学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文学进化思想得以确立，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发生变化，爱国主题凸显，语言与文字交合使文学通俗化，近代的白话文运动是对封建社会沿用三千年的文言文的一次有力声讨和冲击，就其性质而言，无疑是其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哨之战。这一时期，回族的仁人志士，紧随时代变革大潮，与时俱进，在冲破黑暗、追求光明、冲破封闭、走向开放的斗争中，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大变革中，在中国新文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龚选廉、黄镇磐、马君图、刘孟扬等一批杰出的文学人才，为近代回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为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一批迅速壮大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一部分努力探求改变中国现状的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联系着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宣传民主思想，倡导科学精神，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以磅礴的气势给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重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产生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十月革命的胜利，吸引了中国人的视线。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内出现了组织进步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将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积极撰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

利，阐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他所宣传的主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仿效俄国革命经验、重新考察中国问题的意向，也是中国人用先进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关注，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发展。这期间，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了这场斗争，运动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最终五四运动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直接斗争目标以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而告实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取得了进一步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广泛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显示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推进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阶段，青年学生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知识界空前活跃，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她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一起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起的巨大力量。

抗战期间，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觉投身于抗日斗争，文艺基调表现出激

昂的英雄主义，所有的文艺形式以救亡为中心，一切宣传内容以抗日为主题，团结一致，为全民族的抗战而呼号，形成中国最广泛、最持久的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的中国回族先进人士紧随时代变迁，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民主革命运动不断打击着中国的封建传统，也促进了我国各民族民族平等思想观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俊、郭隆真、刘清扬为代表的回族革命者积极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将民族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成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是全国性抗日群众团体，拥有省市分会十六个，对组织各地回民参加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回族抗日团体的出现也是回族觉醒的重要标志。广大回族知识分子、清真寺阿訇宣传抗日，进行抗日外交活动。回族军政人士在抗日战场上打击日寇。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抗日武装的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参加解放战争，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贡献了力量。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新诗逐渐成为我国诗坛主流。许多回族青年诗人用新诗来表达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革命事业的心声。诗人沙蕾1933年出版《心跳进行曲》和《夜巡者》两本诗集。1937年任《回族大众》社长兼主编，同时任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主席，用沙蕾和笔名月群在《抗战文艺》、《大公报》、《文艺复兴》和《新华时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抗战诗篇，强烈控诉日寇的侵略行径；抗战胜利后，他又用诗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罪恶，《警告》、《控诉者和凶手》等诗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日战争后，木斧发表诗作一百五十多篇，表达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东天》、《我们的路》及《血，不能白流》是这类诗作的代表。

20世纪30年代始，回族作家创作的小说开始问世。沙蕾1934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热情交响曲》，194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幼小的灵魂们》。擅长古典章回小说创作的沙陆墟抗战期间曾在报刊上连载《岳飞新编》，通过岳飞抗金的事迹鼓舞人们的抗战爱国热情。此后又于1946年出版小说《水浒二妇人》、1948年出版长篇小说《潘巧云》。另外，白平阶也于这一时期创作有中短篇小说，其短篇小说《跨过横断山脉》被收于1938年《我们抗战这一年》特辑。这一时期还有胡奇的小说、报告文学及穆青的新闻作品问世。

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回族的翻译文学和报刊文学较为集中、丰富，也体现了回族现代文学的创作优势及特点。王静斋、马坚的

《古兰经》翻译、纳训及纳忠的关于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学的译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图书市场，广泛地宣传和普及了伊斯兰文化。同时马宗融作为我国较早介绍法国文学的翻译家，也对雨果、司汤达、左拉等著名作家作品和阿拉伯传说故事进行了翻译与介绍，促进了国人对外国文学的了解。《醒回篇》和《正宗爱国报》作为近代发刊的回族报刊，标志着回族报刊文学的出现，现代回族刊物达百余种，《清真月报》、《中国回教会会刊》、《月华》、《伊光月报》等影响较大。

第三节 近现代回族文学的主要特征

纵观近现代的回族文学发展史况，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高扬。中国回族从其先民进入中国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潮流的发展而演进，文学发展也不例外。反帝反封建作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回族文学的基本特征。爱国主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其标志是对渐趋崩溃的封建社会进行历史的批判和反侵略爱国主义文学潮流的形成。如马福祥等人的诗文就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实践，表现出了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对社会民主进步的向往以及救国救民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一时期的回族报业人士也以同样的热情积极倡导新闻自由观念，反对思想束缚，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是以伊斯兰精神中国化的文学实践体现鲜明的双重文化特质。回回民族在长期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在不断的调适中，逐步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再造过程，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有的文化类型，即回族文化。这种文化交融的过程，不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简单交汇，而是回族人长时期以来为适应生存而选择的“适我所需，为我所用”、相互融合的结果。这一过程实现了回族人在对伊斯兰文化的坚守和对汉文化的接受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性的有机结合，这其中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成分，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回族人独有的心理素质 and 思维方式上，体现在回族人对于汉文化既接受又排斥的不同趋向上，体现在回族人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常常以汉文化形式展现但却包含伊斯兰文化内核基因的特殊把握上，这种特殊把握造就了回族文化鲜明的双重文化特质，而这一特质同样体现在近现代回族文学的创作上。如以马元章、马德新、马观政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字基础及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回族作家，继承发扬明清

以来“以儒诠经”的传统，撰写了大量诠释、发扬伊斯兰文化精神的文章著述，积极创作以传统汉文学体裁体现回族人宗教信仰、展现回族民俗风情的诗歌、文章，以传统中国文学的方式坚守着伊斯兰精神，同时，这些回族作家也以强烈的热情和认同感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文学精神，体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豁达包容的入世态度和兼容并蓄的思想品格。投身于文学的回族人士精通中国文学传统，在题材类别、艺术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承袭了中国文学传统，这一良好的汉儒文化修养不仅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文本中，也同样体现在回族翻译作品中。回族人的译介活动自明清以来一直持续不断，近现代的回族翻译文学以《古兰经》及阿拉伯文学经典的汉文翻译为代表，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国度的文学精神及文学品格的交融互换中，实现了伊斯兰精神中国化的文学实践，彰显了回族文学的双重文化特质。

三是在新旧文学的冲突与传承中，彰显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同中国文学一样，中国近现代回族文学明显带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奠基铺路、衔接古今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在新旧文学的冲突与传承中体现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体现现实主义文学倾向。近现代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文学乃至回族文学，它体现出了全新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生的精神风貌和崭新的文学表达方式，体现着新文学、新文化、新观念与传统旧文学、旧文化、旧观念的冲突、转折和变迁，但同时它也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品格，在文学实践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割舍，相互关联，二者结合共同完成极富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展现。近现代回族文学无论是在主题体现、体裁选择、艺术手法、语言风格上都带有新旧杂糅、交替变迁的特点。近现代回族作家在新旧的冲突与传承中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既延续了感时忧民、愤世嫉俗的传统精神，又展示了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着富有时代色彩的文学创造与更新，这是这一时期一代回族有识之士的一个宝贵的文化品质，也是他们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写作追求的特点之一。

回族近现代文学作为古代与当代的一个重要链接，承前启后，衔接古今，这正是近现代回族作家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段发挥的特殊的歷史作用，也正是近现代回族文学之于整部中国回族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第一章 近代回族文学（一）

第一节 近代回族文学概述

这里所论及的近代回族文学，主要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近代回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些回族作家，他们的一生跨越了近代和现代，但因其主要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是在近代，故我们将他们归类于近代作家。为了兼顾其创作生平和作品的全貌，也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一并将他们现代的文学活动和作品作了介绍。

以1840年到1842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海战前的四五十年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古老封建帝国的大门，中国在军事上的节节失败和对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经过戊戌维新变法、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云南及西北回族反清起义，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是风雨飘摇。

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西方发达的政治、科技、文化等也随之进入，对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使长期闭关自守的状况得以改变。西学东渐，以强盛之势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各种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学注入了新内容，中国政治家开始放眼看世界，一些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在继承明清“经世致用”传统之际，注重了解西方情况，研究实际问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此变革图存。

在此进程中，中国近代文学包括回族文学也经历着变化，以“经世致用”为契机，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突出，反对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反对衙门和官吏腐败无能、抨击国民劣根性的文学，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中西文化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主题、新的审美风范、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一种崭新的文学随之出现。

中国近代文学以1894年甲午海战和1905年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为界，可

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在此进程中,出现了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维新变法前后由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仁人为“改良群治”而发动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涉及各主要传统文体,影响深远,使得中国文学开始了与旧文学诀别、向新文学迈进的艰难历程。其中有影响的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梁启超则竭力推行“新文体”,他宣传的改良主义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新派诗人黄遵宪则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①的主张;裘廷梁、陈荣衮则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②的主张;戊戌变法在把康有为、梁启超等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派诗”、“新文体”、“新小说”、“新剧”等推上了文学舞台。

中国近代文学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奠基铺路、衔接古今的作用^③,因此,对于近代广大的作家而言,最大的苦恼莫过于夹在传统文学与域外文学夹缝中面临抉择时的困惑。当他们声称要反叛传统时,却又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学的血缘亲情;当他们表示要归依传统时,域外文学的光怪陆离又使他们时时“移情别恋”。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激荡和商品大潮的冲击是近代作家及文学面临的又一困境,他们既不愿为改良群治而背离读者,又担心一味媚俗而丧失文学净化人心的初衷,从而使得近代中国文坛犹如摆钟,常常在政治化和娱乐化之间摇摆不定。而最为后世所肯定和注明的,是近代作家对域外文学的积极引进和借鉴。

在上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近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近代回族文学也经历着变化,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有着回族伊斯兰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双重背景的近代回族志士仁人及作家们在坚守信仰和传统的同时,顺应社会变革大势和政治文化演进之浩荡潮流,记录时代风云,追求光明进步,弘扬信仰,抒写人性,自觉融入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之中,为近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推波助澜,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大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

中国近代回族文学创作及作家队伍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遣怀言志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回族中涌

① 参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2)》。

② 参见裘廷梁1898年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和陈荣衮1899年的《报章宜用浅说》。

③ 汪龙麟.中国近代文学史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现出了一批用诗歌、散文抒写历史与现实、鞭挞时政、记录时代的作家，代表人物有马之龙、哈锐、马君图、蒋湘南、马介泉等。

近代回族作家的诗文创作，遵循近代政治文化演进之大潮，创作了一批具有思想性、时代性、民族性的诗歌、散文佳作。哈锐的诗文反映了历经世事沧桑、宦海沉浮的老者的平和心态与无奈，述写了哀鸿遍野动荡的社会现实。马之龙的诗作歌咏赞美名川秀水、美丽风光，通过对奇景异物的描写，表现高远淡泊的志向和傲岸不屈的性格。蒋湘南的诗鞭挞社会现实，发个人之忧怨，抒胸中之豪情，写山水之风景。其咏史诗风格别具，触景生情，多借古鉴今，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思，对现实的思考；时论文章，表现了一位官场失意者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危机的睿智思考。

综观近代回族作家的这类创作，在艺术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诗词创作在继承前人传统手法、讲究格律章法的同时，形式灵活，风格多样。以常用的诗歌形式如五言、七言、律诗、乐府及仿古诗、叙事诗等多变的形式表现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与灵活形式相对应的是多样的诗歌风格。诗风或刚健苍劲，或温和闲适，或黯淡悲凉，或明快清新，或富于哲理，启人深思。讲究格律章法、用词造句，以古体诗反映时代新内容，古体诗这一文学形式在近代回族诗人手里运用得娴熟自如。

第二，题材广泛。近代回族作家创作的诗文，有感时而作，关注人民生活疾苦的；有咏史谈古，抚今追昔的；有描写风光，记述行程游踪的；有遣怀言志，抒发胸臆的；有写景状物，寄情其间的；有酬唱赠答，送友怀亲的；有题画赋诗，谈论书画的。古体诗中的咏史诗、记游诗、题画诗各有千秋。咏史诗虽写古人，意在今朝，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感时忧国，“上下五千年，纵横七万里”，跳出历史时空的束缚，以新颖大胆的见解，引发人们对现实、对历史的思考；记游诗融情山水，借景抒情，借物咏怀，借物言志，描写生动自然，绘声绘色，融情于景，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题画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画共存，诗与画和谐有机地融为一体，诗情画意，尽情挥洒。

第三，语句简短、凝练，语言流畅、平实。联想丰富，看似写景状物，实则表现高远淡泊的志向和傲岸不屈的性格。多用质朴、平实之语，不乏口语，词浅意深，自然流畅，在力求通俗的同时，讲究句子的锤炼，使诗文呈现出纷繁多姿的色彩和奇特开阔的意境。

第四，记游类散文描写生动感人，观察细微，情思飞扬，语挚情浓，清隽秀雅，

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政论类散文，爱憎分明，博喻广证，借题发挥，言之有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人深思，寄托着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

其二，宗教文化类。清末民初，回族中的一批知识分子继承发扬明清以来回族知识分子“以儒诠经”的传统，创作了一些反映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的诗歌、文论，撰写了一批诠释信仰、教义、功修的文章，代表人物有关里爷、马元章、马观政、马德新、马安礼等。

近代回族阐述信仰、宗教文化类作品的创作，表现出近代回族文学显著而独有的特点。这些作家多为宗教界知名人士，有着双重文化背景，既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伊斯兰教文化知识，他们用汉字书写了许多传播发扬阐述伊斯兰教文化的诗文，在近代中国文坛上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在回族乃至国内外各民族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里爷为后世留下的风格独特的散文体哲学论辩著作《热什哈尔》，既是一部宗教意义上的神圣经典，也是一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秘史，又是一部民间传说的神奇之作。马元章是哲合忍耶导师、掌教中兼通汉文、阿文并有论著行世的人物，他的古体诗、楹联雅洁端庄，通俗质朴，以诗歌的形式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西北、云南一带影响深远。马观政在致力于民族教育之余，以亲历亲见撰写的《咸同滇垣十四年大祸记》，记述了云南昆明咸丰丙辰六年（1856年）发生的屠杀回族事件的始末、事件的动因及残酷的屠杀过程，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毕生致力于阐扬伊斯兰教教义和文化的马德新用他的著作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修持、教法、礼仪和哲学，《朝觐途记》是他文学成就的体现，是一部极具典型性和地方特色的回族文献。马安礼在翻译之余撰写的《续天方三字经》，讲述天地生成、信仰、功课、伦理、道德等内容，对宗教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有积极影响。

近代回族文化人阐述信仰、宗教文化类的作品，从艺术特色上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近代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回族人物创作的诗文，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信仰、功修、教义、品行修养、教派历史、先贤事略、朝觐纪实等，既有对教史教义的记述，又有对信仰的讴歌；既书写国家大事、百姓命运、民间疾苦，又抒发个人感受、心境，省身励志；既写人记事，又咏史怀古，借古喻今。

第二，思想深奥，哲理性强。他们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史论、时论文章，篇幅短小，文字精练，讲究遣字造句，立意高远，有着强烈的思辨色彩；常常以简短的篇幅、精练的文字，论述治国理政、齐家修身、立世做人的大道理，既有文